

给变革一个空间

30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30周年纪念丛书

丛书主编：周红云
丛书副主编：刘 英

Finance Market and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金融市场与 金融体制改革

丁开杰◎主编

中国的金融深化：顺序性与难题 [美] 罗纳德·麦金农
中国的金融体系何时能满足其需要 [美] 尼古拉斯·拉迪
我国金融市场形成的两个问题：金融抑制与经济气泡 吴敬琏
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 [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证券市场失败的教训：私有化、少数股东权利保护和投资者信心 [美] 小约翰·科菲
金融市场中的披露管制：现代金融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的意义 [美] 斯蒂芬·罗斯
法律、执法与金融监管——介绍“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 许成钢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给变革一个空间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30周年纪念丛书

丛书主编：周红云

丛书副主编：刘 英

Finance Market and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金融市场与 金融体制改革

丁开杰◎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 / 丁开杰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117-2834-0

I. ①金…

II. ①丁…

III. ①金融改革—中国—文集

IV. ①F83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1978 号

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霍星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76 千字

印 张: 25.75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序 一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回顾^{*}

荣敬本^{**}

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办的缘由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办于1985年，到现在正好30年。在杂志创办的前一年，正好中共中央通过决议，肯定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决议在当时意义非常重大。是否发展商品经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因此，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被邓小平同志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当时的经济体制比较研究起到了关键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大都怀着革命的理想，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现实中，却出现了实践和理论相背离的现象。作为以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己任的中央编译局，最早是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的。

^{*} 为纪念《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30周年，杂志社对荣敬本教授进行了访谈，本序是根据访谈录音整理而成，原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5期。

^{**} 荣敬本，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主编之一。

但从建局伊始，中央编译局的领导就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翻译和研究相结合，并于1985年成立了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即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时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的王惠德同志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需要重新认识，局领导们也认为中央编译局的发展在于“走出36号院”。因此，中央编译局的领导派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当时经济研究所的刘国光所长和董辅初等同志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吴敬琏、赵人伟老师提出研究比较经济学，首先要搜集一些比较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资料。我记得我最早搜集的资料是一本关于比较经济学的书，书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提法：“主义”的比较已经过时，应该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体制。因此，在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中，应该摒弃“主义”的简单对立方法，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采取比较借鉴的方法，去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在开展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时，我们把一些比较经济学的重要文献翻译过来，汇编成册，供大家研究。与此同时，经济研究所也邀请了一些东欧国家最早主张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经济学家到中国访问讲学。这些讲学材料和有关著作，依靠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力量很快译成中文，并向中央有关部门作了报告。

在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经济体制的差异归根到底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差异，也就是说，是按市场配置资源还是按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在经济所访学期间，我们曾到深圳去调研，那时刚刚改革开放，火车站内全是从香港运来的产品。根本问题在哪？在于我们的企业没有自主权，只是按照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需求来确定生产的产品和数量，企业缺乏激励和动力，提供的产品不是消费者所需要的。

因此，在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大背景下，当时分管中央编译局研究工作的副局长林基洲同志和常务副局长顾锦屏同志建议我们主办一个刊物，以便开展更广泛系统的比较研究，探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林基洲同志多次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办刊的问题，刊物的名称也是经过多次反复的讨论。大家都赞成要突出“比较”，但在刊物名称上，当时提出了两种方案：一个是“比较社会主义”，另一个是“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前一个名称容易陷入“主义”的比较，后一个名称虽然太长，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但考虑到经济社会体制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具体组织形式，通常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必将成为时代的主流，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动力。因此，经过讨论，大家同意采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这个刊名，现在回想，这个刊物的名称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经受住了考验。

在确定刊物名称后，就进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在当时，办刊物本身就存在很多困难，主要有三大困难，或者说是三大风险：一是政治上的风险，万一犯错误怎么办？二是经济上的风险，如果办刊物亏损怎么办，谁来承担这个风险呢？三是工作风险，谁来做，谁来编，如果自己做，那么意味着编者要额外承担很多工作，翻译、编辑、出版、发行等，纷繁复杂。但是，回头一想，我们为发展商品经济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现在中央给了很好的有利条件，我们要相信党。经济困难虽然有，但是如果能得到社会资助，困难可以克服。至于工作风险，一些青年人表示他们会大力支持。吴敬琏老师当时也很支持，说任何报酬都不要，要把杂志办好。因此，在中央编译局领导和社会各方的大力支持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于1985年面世了。

二、比较杂志的办刊宗旨——理论联系实际

杂志在创刊之初目标就很明确，不搞“主义”的比较，不去评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而是要作体制的比较研究，通过各个体制的比较来吸取经验，探索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怎样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刊时以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想为基础开展研究，系统介绍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拉丁美洲国家从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还翻译和刊载了以这些经验教训为蓝本的经济学重要文献。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杂志当时围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组织刊发了一系列文章，提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包括价格、金融、财税、外贸、劳动、企业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同时，改革也会涉及各方面的利益调整，必然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波动，因此维持社会稳定对改革顺利进行意义重大。要保持社会稳定，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控制总需求，防止通货膨胀；加强法制建设，惩治腐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防止收入不合理扩大，等等。

这些论文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引起了体改委领导的重视，时任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同志曾召开座谈会，并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推荐给其他相关部门。我们在座谈会上主张财税、价格联动改革。但是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后来大家主张价格改革，在讨论价格改革怎么改的时候，有的学者主张实行价格双轨制，但这样又产生了寻租现象。因此，从1988年起，我们就组织了关于寻租问题的讨论，把“寻租”这个概念引入到国内来，并指出“寻租”是我国改革进程中某些官员腐败的根源。当年关于寻租问题的讨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关寻租问题的文章和资料于1989年汇编成《腐败：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一书出版，成为研究腐败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

企业改革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关注的又一个焦点问题。杂志当年曾刊登过一篇文章，问：“中国有企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久，杂志又在国内首先发表了科斯的著名论文《论企业的性质》，由此引入对企业性质的探讨。构成企业最重要的因素是产权明晰，而我们的国企名义上产权属于国家，但实际上产权是模糊不清的。关于企业改革，当时各方意见不一。有人提倡承包制，因为农村实行承包制取得了成功，那么是不是承包制进城，就能取得成效？但企业的承包远非那么简单。因为企业的承包关系到企业包给谁，如何监督，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会造成更严重的腐败。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反对搞承包，因为“承包制”解决不了产权明晰问题，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那时的青年学者周小川发表了很多文章讲法人资本主义，提出对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不要关注它姓资姓社，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形式是可以研究的。我们当年对企业管理形式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还多次专门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参会的不仅有学者，还有各类企业如国企、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代表。

1988 年的企业座谈会在江门召开，与会学者指出，不改变原来的所有制形态，很难推行面向市场竞争的企业改革。那时有人提出搞企业承包制，但搞企业承包，负面作用很大，也许暂时会收到效果，但长远不行。周小川提倡法人资本主义，研究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当时国内很多有名的企业领导都来参加江门会议。我们讨论了一个问题，中国有企业家吗？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没有企业家。没有企业创新，何来企业家呢？没有企业家，又如何能办好企业呢？企业都是依指令定生产，缺乏创新精神。所以杂志主张，真正地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的、产权明晰的、有科学管理的企业制度。这个议题我们当时讨论了很多很多，认为不能说姓资姓社，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能评判姓资姓社，股份制企业不能说它姓资还是姓社，更不能否定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要好好学习借鉴。

1988 年在庐山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更明确地指出，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产权明晰，建立有利于资产保值增值的现代股份公司，只有把企业改造成现代股份公司，才能使企业真正成为在市场经济中展翅的雄鹰。杂志后来还曾在苏州召开座谈会，陈清泰和楼继伟都参加了会议。会后我们到了上海，时任市长的朱镕基接见了我们，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有些人不懂经济，你们可以大胆地搞。碰巧的是，我们这次上海之行还见到了上海前市长汪道涵同志，他看了我为杂志出版的《腐败：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一书所做的序言，说写得很好。在诸位领导的肯定和鼓励下，我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此后放心地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三、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们预感到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提上日程，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展开深入研究。1996 年初，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以杂志为中心，组织了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一些研究精英，成立了“县乡人大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考虑到研究的问题在当时比较敏感，因此，在反复讨论后，我们决定从县乡两级政府

入手。课题组的调研选择在河南省的新密市进行，除了在新密市走访市级党政部门外，课题组还分别去当地的一些乡镇作实地调查。在新密的调查中，当地官员经常提到三句话：“加压驱动”，“热锅理论”（形容官员是热锅里的蚂蚁，必须不断运动来避免被灼伤），“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显然，这三句话形象地描绘出基层政府运行的基本模式。上级给下级施压，制定各种指标，完成指标就可以提拔，但如果没有完成指标就要被降级、处罚，实行一票否决制。我们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4期上发表了课题的研究报告之一：《县乡两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建立民主的合作新体制》，提出了“压力型体制”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课题组的总报告又对“压力型体制”的运行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压力型体制”是中国计划经济中的动员体制在现代化和市场化压力下的延续，是经济转轨过程的产物。1998年，课题组将其研究报告汇编成书，以“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为书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压力型体制”这一概念出来以后，在当时获得了学术界，尤其是刚刚兴起的农村问题研究领域学者的认可。

四、寄语未来

与以往相比，杂志现在所处的境况要好得多，领导也非常重视。尽管也存在一些困难，但机会和机遇也很多。因此，在杂志未来的发展中，比较研究的视野可以更开阔些，不仅要研究分析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要研究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比如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文化，很多问题都非常值得研究。此外，我们国家农业人口占比很大，农村地域广阔，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关系到我国未来的发展，因此，要理论联系实际，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角度加强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比较研究。

总之，希望杂志在回顾发展历史、总结以往经验的同时，在未来能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办得更精彩、更有影响。

序 二

比较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

[匈牙利] 雅诺什·科尔奈^{**}

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刊 30 周年之际，我对杂志的编辑和读者表达真挚的祝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在中国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伟大变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精神生活的复兴，以及源自全球社会科学新思想的传播都作出了贡献。关于此，我还想说：鄙人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有直接联系，杂志曾发表过我的多项研究成果。这使我感到荣幸，因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使中国同仁了解了我的思想。

在以下内容中，我力图回答两个问题，它们看起来与此次庆典相吻合，

^{*} 本序为科尔奈教授为纪念《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刊 30 周年提供的稿件。科尔奈教授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的老朋友。早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 1985 年的创刊号上，杂志就介绍了科尔奈教授的著作《短缺经济学》和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此后，杂志还介绍过科尔奈教授的《匈牙利经济改革的若干经验教训》（1986 年第 4 期）、《经济改革设想和现实的对照》（1986 年第 6 期）、《匈牙利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经济改革——访问随笔》*（1987 年第 5 期）等文章。本文原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 年第 5 期。

^{**} [匈牙利] 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终身研究员。科尔奈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对中国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提出改革理论，曾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译者张定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

即两者都是展望未来的。一是大家熟悉的“比较经济研究”的前景如何？二是由比较经济研究衍生出的分支学科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借此机会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发表一点拙见。

一、“比较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詹科夫等人在 2013 年曾撰写过一篇关于新比较经济学的文章（Djankov et al., 2013）。他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新方法，引起很大关注并激发了一场生动的辩论。在导论中，该文为将比较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划分为新旧两个阶段提供了依据。在“旧阶段”中，只要社会主义经济仍在发挥作用，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始终是比较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但随着一些社会主义经济崩溃，世界面临贫穷、低效和大规模杀戮，对“主义”进行比较的研究就不再是“比较研究”关注的议题。在“新阶段”中，唯一的论题是对如今胜利凯旋的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进行比较。^① 在那些不相信这种划分法的人中，我是持中立立场的。

首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制度巨变之前，学者们已经对各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比较。几十年来，围绕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争论从主题上看可以概括为如下内容：是否只有双手沾满血腥的极端集权的、让大众饥肠辘辘的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形式？我们是否可以描绘出另外一些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能否实行某种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能否实行某种形式的“更像样的”的民主社会主义？

从时期来看，对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进行白热化的比较，与对社会主义改革的争论是同步进行的。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日本的经济处在巅峰之时，美国和西欧的许多人士就以极大的兴趣关注过日本经济奇迹。

^① 我在此处和本文其他地方所使用的“资本主义不同类型”和“社会主义不同类型”的术语与霍尔（P. S. Hall）和索斯凯斯（D. Soskice）所著的那本具有影响力的著作《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以及其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之后出现的文本中对该术语的运用，是同样的意思。

他们试图理解：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经济部门对经济过程进行积极干预的程度如何，以及最重要的问题：投资是如何分配的。^①多年来，无数的学者倾向于将日本奉为典范，这种倾向直到日本经济下滑并开始出现长期的停滞，才戛然而止。

尽管存在成王败寇的事实，但仍然有人雄辩地支持继续聚焦于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大制度”进行比较：

1. 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对照，那么资本主义的属性就更好理解。严格的二分法（sharp dichotomy）能提供海量信息，并非唯独我们的研究领域如此。例如，自然科学对这种“大”的分类进行界定和比较：有机物质与非有机物质，活生物与死生物的比较，尤其是在有生命的世界中，对新近进化有机物族群与其他族群，如脊椎动物与非脊椎动物的比较，哺乳动物与其他脊椎动物之间的比较，等等。我的研究工作就是对“大体制”（great systems）进行比较。拙著《动力、竞争与过剩经济》（*Dynamism, Rivalry and the Surplus Economy*）对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短缺经济和具有资本主义特点的过剩经济作过比较。这种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制度因素的作用。两种制度在体制框架、动机和行为规律性上都彼此迥异，其中，一种制度存在普遍、长期和严重的短缺现象，而另一种制度则具有普遍、长期和严重的过剩现象。

2.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时存在着与某些社会主义特性相像的“岛屿”。公有制而非私有制在其中居于支配地位；是官僚机构而不是市场在协调着人们的活动。比如许多国家的公费医疗。在这些“岛屿”上，由于实行免费和行政开支大幅削减的缘故，大量事例可以证明短缺经济现象，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症状存在，比如排队、漫长等待、买方（在这种情况下即患者）任由卖方（卫生当局）摆布。如果我们知道，类似的安排不只是被插入“岛上”，而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式时的真实情况，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岛屿”的运作。

^① 日本经验比较研究的开创者是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他将日本和中国的体制分析用于制度比较的综合研究之中（参见 Aoki, 1988, 1994, 1996, 2007）。

3.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历史现实中失败了，但它继续存活于许多人的脑海中。有关调查令人信服地表明，一部分人念念不忘变制之前的那段时间，他们相信那时的生活更加美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怀旧程度不一，俄罗斯是怀旧情绪最浓的国家之一。经济问题愈多，怀旧情绪也就愈浓。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这些人用一种“虚假意识”来评价社会主义，是毫无意义可言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对变制之前阶段的珍视，是一种心理事实（psychological fact）。不同的“新左派”政治思潮可以建立在这种扭曲了的集体记忆之上。与其说这些思潮建立在对过去的理想化记忆之上，还不如说它们试图窥见想象的、新的、更好的社会主义愿景。他们的推理基于这样的想法：“不错，在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形式的专治社会主义时代，的确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让我们重新开始，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采用新的、更好的领导。”如果我们恰如其分地理解社会主义特性，如果我们能够解释这些严重的溃败及可怕的后果不是由个人属性或是由这个或那个领导人的错误决定所造成的，而是制度本身的基本属性所造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力地对这种观点进行回击。

因此，在我看来，我会强调“比较经济研究”的连续性，而非强调与1989—1990年间的体制发生巨变有关的断裂性。不同层次的学者之间有着连续性，而且新生代学者不断加入其中。研究项目的组织机构的参与者和出版机构之间也有着连续性，新的机构从开始就一直在形成，其名称都与“转型”相关。由此，让我们转向第二个论题。

二、“转型经济学”的未来

1987年，有28个国家归共产党统治。^①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28个国

^① 这个数字是从我的专著《社会主义体制》中提出的。其他很多学者也引用了其中公开发表的列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可能是一种共识。

家演变为 48 个继承国。^① 在 28 个国家当中，唯独朝鲜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保留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属性，古巴也可能是这样，但是古巴已经隐隐约约发出转型的信号。在其他国家，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它们现在带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属性。这在曾经的社会主义的中东欧国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苏联的继承国家更是如此。

我了解国企在中国和越南有巨大力量 and 影响，不过我敢断言，整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领域“转型”期已经完成。但是，政治领域的转变与此大相径庭。保罗·亨廷顿（Paul Huntington）在其经典研究，即 1991 年的文章和当年的著作中，用“第三波浪潮”来命名 1974 年至 1991 年间众多国家从专制独裁政权向民主政权的转变，以及政府政治形式的巨变。第三波浪潮的最后阶段席卷了后期的苏联以及共产党统治下的中东欧，但是从未波及越南。亨廷顿警告说，新的民主政权很脆弱，我们无法排除这些民主政权最终不能长治久安的可能。

这就是发生在俄罗斯的情况。当历史学家划分历史阶段时，他们喜欢将该阶段的起止与日历上的日期加以联系。记住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俄罗斯历史上短暂的民主阶段始于叶利钦 1991 年就任总统，终于 2000 年叶利钦卸任总统。不论那时的经济政策多么动荡、多么暧昧，那几年俄罗斯的政治形式具有民主的所有基本标志。在普京 2000 年掌权后，俄罗斯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独断专行的政治体制从那时起就形成了。

亨廷顿的危险意识在匈牙利也得到了证实。自 2010 年以来，匈牙利的政治领域发生了大逆转，在 1989 年至 2010 年的 20 多年间——在众多严重的失败、失误、磨难和经济问题中，仍然自行确立了民主制度。但是自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和他领导的政党掌权以来，几种民主体制被陆续废止，新的独裁制度涌现出来并已相当稳定。^②

① 这个总数只包括国际法所承认的国家。它不包括前任国家塞尔维亚所不承认的科索沃，以及从苏联领土涌现出来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纳卡地区。摩尔多瓦是包括在内的。

② 参见：Kornai, 2012, 2014b; Magyar, 2013, 2014; Scheppele, 2014。这五部著作提供了许多进一步参考的资料。可惜的是大部分的研究只有在匈牙利进行。

这种倒退与亨廷顿所用的视觉比喻“浪潮”意象是极为吻合的。坐在海滩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浪又一浪冲上岸，而第三波浪可能甩脱许多泡沫，抽身而退。

从政治领域来看，我们将这些处于后社会主义国家区域的所有国家划分为三类：

A 类：民主国家

这里，我会列出以下国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C 类：专制国家 (the dictatorships)

越南属于此类。^① 这个国家已经发生很多变化，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发生了很多变化。在胡志明当政的时代，共产党掌权，其政治纲领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不仅可以从共产党的辞令中窥见一斑，也体现在其行动上：消灭私有制，根据中央的命令引入协调机制。后来，共产党开始了与经济改革并行的改变。它保留了名称，并且仍然提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词。党的最高层与企业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将这些变化与早期的恐惧作比较，压制已经放松。

B 类：独裁国家 (the autocracies)

这类国家居于 A 类和 C 类国家之间。独裁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它具有居中

① 我已经在属于 A 类的国家名单中作出了说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曾经是苏联的共和国，已被列入民主国家。属于苏联的其他继承国家没有在此列出。其中哪个国家应当被列为专制国家，哪个应当被列为独裁国家，我心中没底。那些熟悉这些国家政府体制和政治领域状况的人在作出这种判断上是唯一具有发言权的。不过，现在已经明了，我将苏联最大的继承国俄罗斯置于独裁国家而不是专制国家之列，这在以后还要进行讨论。可惜我对许多的非欧洲国家的政治发展情况不太了解，而这些国家在 1987 年的 28 个国家的列表中是处于突出位置的。

性。它不是民主国家，也不是专制国家。这里强调两个“不是”，就是要充分理解其性质。^①

普京的俄罗斯和欧尔班的匈牙利，由于清除了许多基本的民主制度，所以不是民主国家。让我列举几个事实：权力部门之间持续分离，议会对于政府进行有效控制，法院的各个方面完全独立，包括独立的宪法法院，有一套针对权力争夺的有效制衡制度，从法律角度来看，相互竞争的政党在选举中机会均等。当权的政治力量“强化”自己，在自由的议会选举中不能被解散。

同时，有一点必须指出，独裁（autocracy）并不是专制（dictatorship）。有些绝对重要的属性可以将“独裁”与“专制”加以区分。多党制保持下来，反对派势力可以自由组织，反对派政党在议会中有代表。让我们思考一下俄罗斯的例子。在俄罗斯，抗议被压制，但抗议不是不可能的；抗议者会被大批送进监狱或在人群中被枪杀。基于虚假的指控作出判决，几个重要的反对派政治家被长时间囚禁。这具有一种威慑效果。然而，摆样子的公开审判、古拉格集中营、将数百万人推向死亡的运动的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死亡恐惧，并未征服现在的俄罗斯社会。

总而言之，独裁不是专制，但我没有在“不是”（not）之前加上一个“还”（still）字。我们不能说，独裁变成专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独裁统治的政治条件可能是稳定的，且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也可能由于某种历史性“地震”而寿终正寝。

一个类似的公开问题是，后社会主义专制政体的政治领域有着什么样的未来？专制的较弱形式会被更为强硬、更为残忍的镇压手段所取代吗？抑或一种反方向的进程得以开启，政体（不论快慢）将转变成独裁或民主？

① 在政治学和政治的日常语言中，其他具有中间性质的名称也广为流传，如，“吝啬的民主制”（Fareed Rafiq Zakaria, 1997）。在匈牙利的版本中，受到卡尔·施米特著作 [Schmitt, 1923 (1985); 1928 (2008)] 的启示，“Führer-democracy”这个词出现在了 Kőrösi (2003) 的研究成果中。不仅在名字上没有形成一致，在标准的区分上也没有形成共识，而区分一个民主国家和一个非民主国家是需要一种标准的。这段短篇幅的引言不足以使作者加入到涉及介于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政府形式的概念性和重大性讨论之中。

我从自身的经历，尤其是通过学习世界历史认识到，对重大转变不可能作出牢靠的预测。相似情形的数量太少了，不足以使负责任的学者做出在统计学上“生效”的结论。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尤其是质变，都是由一系列不可复制的不同政治、经济、地方和国际性的一次性因素造成的。我们可以解释法国革命的不同系列因素，但不能把它们用来解释 1917 年俄国革命或者 1956 年匈牙利革命；“利比亚之春”既不同于“突尼斯之春”，也不同于 2013—2014 年的乌克兰事件。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将后社会主义故事的政治并发症前置，是出于多种动机。我不敢苟同许多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普遍的做法——他们试图固守专业界限。比较经济学家们只关注中国、俄罗斯和波兰的 GDP 和预算，结果他们无力对与经济变革并行的其他生活领域正在发生的改变作出判断。比较政治学者只关注政治事件，而不愿操心经济变化。实际上，跨学科方法是不可或缺的。

现在，且让我回到引言中所提到的问题：“转型经济”的未来。在一个基于经验研究和现实变化观察的研究项目中，这个问题既与观察和分析对象不可分，也与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相连。这种“转型”在经济领域已经完成。这同样适用于以上三类国家，而这三类国家的政治结构有所不同。不论它们之间的差异何等明显，它们的经济是不可逆转的市场经济。

相比较而言，这些政治上多样化的三类国家未来的政治发展却不可预见。在一类国家中，从共产党专制向西方式民主的转变已经完成，它们已经从 C 类跨越到 A 类。但俄罗斯和匈牙利的例子显示，这种变化并非不可逆转，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存在着从 A 类转向 B 类的危险。

那些现在处于 B 类或 C 类的国家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动弹，但它们也的确存在着脱身的机会。存在着这样一种紧迫的危险，即一个或另一个 B 类独裁国家的政府形式退变为 C 类专制政体，或在 C 类国家里，目前尚弱的专制形式会被一种更为残酷的形式所取代。作为一个民主政体的支持者，我希望处于 B 类（独裁）成员国甚或 C 类（专制）的这个或那个成员国